



中國史學論文選集

第四輯

附國內中外中國史學論文索引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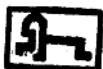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編輯者：王壽南·阮芝生·張哲郎·李雲漢

中國史學論文選集 第四輯

——附國內外中文中國史學論文索引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三號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編輯者：王壽南 · 阮芝生
張哲郎 · 李雲漢

印行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之二號3樓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二七三七號

基本基價：九·一八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

69021

凡 例

一、本集之編纂以採輯當代史學研究新作爲對象，選錄討論國史具有代表性之論文，提供史學教材之補充與參考。

二、本集第四輯選錄論文，以民國六十七年及六十八年所發表者爲範圍。

三、本集選輯論文，暫採以下標準：

(甲) 廣面重大問題之探討與解釋。

(乙) 新方法之實驗與應用。

(丙) 新問題之發掘與研析。

四、本集之選編，因受字數之限制，並爲顧及各時期內容之平衡，故凡屬左列情形者，均予割愛：

(甲) 字數過多者。

(乙) 研究問題過於專門者。

(丙) 輯校、集證類者。

五、本集之編排次序，除史學與通論性質之論文列於最前外，其餘自遠古以迄現代，均採時代之先後安排。

六、本集除選錄若干研討各時代之論文外，並附列同一時期國內外中文期刊所見之史學論文，編成「國內外中文中國史學論文索引」。該索引依總論、通史、先秦、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民國等類別順序排列，每類中又以論文篇名第一字之筆劃多寡排列。該目錄索引所列論文僅供讀者查閱之便，不涉及該論文之內容與水準。

七、本集之應用宗旨有三：

(甲) 選輯史學新知之代表。

(乙) 提供論文參考目錄。

(丙) 總括同時期史學貢獻之實績。

八、本集編選倉促，且選文之際，見仁見智，疏誤之處難免，尚祈方家指正。

序

本會主編「中國史學論文選集」業已出版三輯，本書爲第四輯。「中國史學論文選集」每兩年出版一輯，自民國六十一年始，本書內容係精選民國六十七年及六十八年兩年內之史學論文十七篇，另附錄編製了民國六十七年至六十八年國內外中文中國史學論文索引。

本書編輯主要的目的有二：第一、提倡中國史學研究。中國史學研究與當前教育重點——民族精神教育息息相關，又與復興中華文化並行不悖，因此，本書的編印實與政府當前的教育文化政策相配合；第二、提供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參考資料。本書精選中國史學論文，並附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對於研究中國史學提供了相當可貴的材料和方便，尤其對於教授中國歷史的教師們相信更有助益。

本書第四輯由王壽南、阮芝生、張哲郎、李雲漢四位教授擔任編輯選文工作，史學論文之選擇往往見仁見智，殊難定論，本輯所選之論文十七篇，當然不能表示六十七、六十八兩年內之史學佳作盡收於此，遺珠之憾在所難免，不過，從本輯所選收之論文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史學研究確有可觀之成果。

本書附錄「國內外中文中國史學論文索引」係收錄民國六十七、六十八年兩年內之中國史學論文篇目，所搜集的期刊共達一五三種，包括了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所出版的中文學術性刊物。本索引仍

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主任王壽南教授編輯。本輯之出版，使從民國六十一年以來在雜誌刊物上發表的史學論文都有索引可尋，相信爲史學界人士提供了許多方便，也可以從索引中看出這個時代中國人對本國史學研究的成績。

本書仍承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該公司對文化事業之熱心貢獻，本人深表敬佩。本書的四位編輯先生負責的態度，表現了當代歷史學者勇敢肩負歷史使命的精神，本人特別表示誠摯的敬意。

谷 鳳 翔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十二日
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目 錄

凡例

序

- 一、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余英時……………一
- 二、我國重農輕商思想之研究……………侯家駒……………二五
- 三、公元前五千到一萬年前中國遠古文化資料……………張光直……………七三
- 四、西周封建的特質……………杜正勝……………八三
- 五、戰國至漢初的人口變遷……………管東貴……………一二九
- 六、唐代婚姻約論……………劉增貴……………一四七

- 七、宋代教育與科舉的幾個問題……………李弘祺……………一六七
- 八、金代的用人政策……………陶晉生……………二〇七
- 九、元初南方知識份子……………勞延煊……………二三一
- 十、元初江南的叛亂(一二七六——一二九四)……………黃清連……………二八五
- 十一、明代閣臣之任用……………張治安……………三四九
- 十二、雍正初年清世宗與年羹堯之君臣關係……………陳捷先……………三八五
- 十三、清末天地會與太平天國之役……………莊吉發……………四一一
- 十四、晚清變法思想之淵源與發展……………汪榮祖……………四三九
- 十五、辛亥革命時期北方地區的革命活動……………林能士……………四七三
- 十六、中國航空的發軔(民前六年至民國十七年)……………陳存恭……………五二三

十七、列強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一九三七——

一九三九）

鮑家麟……………六〇七

附錄：國內外中文中國史學論文索引（民國六十七——

六十八年）

王壽南……………六六三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

余英時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史學一向是最有光輝的一門學問。但時至今日，史學在中國竟大為衰落了。必須指出，現代中國史學的衰落並不是一個孤立而突出的現象；實際上它祇是整個學術荒蕪的一個環節而已。在過去五六十年中，撇開自然科學不說，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都不曾在中國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而最能夠提高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的哲學在研究與教學方面也始終停留在起步的階段。史學為綜合貫通之學，必須不斷而廣泛地從其他學科中吸取養料。在這種情形下，現代中國史學之不振可以說是毫不足異的。但是比較地說，由於傳統憑藉的深厚，在現代中國的一切學科之中，史學仍不失為較有成績的一支。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第一派可稱之為「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稱之為「史觀學派」，乃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史學的主要任務。從理論上說，這兩派其實各自掌握到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其上層建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能完成。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是在實踐中，中國現代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由於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史料學派

鄙史觀學爲空中樓閣，而史觀學派則又識史料學爲支離破碎，不識大體。

我們不能在此對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得失展開全面的評論，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兩派在現代中國史學上所產生的某些流弊依然在泛濫中。因此對這些流弊略加檢討，以爲今後史學發展的借鑑，是有其積極的意義的。

史料學派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們的史學和時代完全脫節。主要由於他們對於史學上所謂「客觀性」的問題的瞭解有其局限性，他們假定歷史事實是百分之百的客觀的，可以通過科學的考證而還原到「本來面目」。如果一切事實都考證清楚了，那麼全部的歷史真相自然會顯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樂觀地等待着「最後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的出現。正是根據這一假定，史料學派纔否認史學和時代之間有任何關聯。這一學派的人深信，純粹客觀的史實既能通過一定的考證程序而恢復其「本來面目」，則史學家因自身所處的時代而產生的一切主觀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學之外了。

我們承認，有些所謂歷史考證的工作，其具體結論的正確與否的確是不受時代影響的，如名物制度、訓詁校勘、地理沿革、人物生卒種種方面的具體問題，一旦獲得了正解，便再也不會隨着時代而更動。但是這一類的考證雖然都涉及史學家所必備的基本事實(basic facts)，卻不足以當「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稱，因爲這些基本事實祇不過給歷史提供了一套外在的架構，它們本身並沒有內在的意義，即不能說明歷史的變化。而且即使是這一類的考證，其興起與發展仍不能完全脫離時代。我們不免要追問：史學家何以在某一個時代對某一類的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地理特別發生了考證的興趣呢？

史料學派不但誤認一切基本事實爲歷史事實，而且對每一事實復儘量作孤立的處置。因此他們主張「證」而不「疏」。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配之下，他們的「證」的範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偽這一點上。在這種情形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近幾十年來史學的一般發展使我們認識到，歷史事實之所以成爲歷史事實，是和史學家對它的瞭解分不開的。歷史事實無窮；相對於任何一項歷史上的變化與發展而言，史學家經過反覆的研討，便能在衆多的歷史事實之中發現它們之間主從輕重的複雜關係。這種關係便是對歷史上的變化與發展有所說明。這正是史學家「疏通」的本領，中國史學史上所謂「疏通知遠」，所謂「通古今之變」，其中心的涵義即在於是，所以我們雖然同情史料學派對「證」的強調，但是卻絕不以此爲史學的止境。今天的史學家一方面要用最嚴格的實證方法來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

由於觀點的不同，史學家在疏通的工作上常不免有見仁見智之異。對於同一歷史的變動，史學家根據他們對史實本身及其相互間之關係的不同理解，往往提出不同的解釋(explanation)。這是史學發展的常態。歷史的解釋不但因時代而變，而且即在同一時代也紛然雜陳，不易歸於一是。無論是異代還是同時，總之史學是脫離不了時代的。每一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問題，史學家的注意力便隨着時代的問題而不斷地轉移其方向。並且一般學術研究的日新月異也足以逐漸加深史學家對同一史實的理解。例如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初稅畝」，是一件重要的歷史事實，春秋三傳都曾著重地加以評論；後世制度史家也都注意及之。但是這件事的意義一直要到現代社會經濟史學發展到相當高

度之後，史學家才能結合其他相關的史實加以充分的發揮。而社會經濟史學之興起正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之所在。

史學與時俱變，史學家的解釋也往往互有出入，那麼歷史究竟有沒有客觀性呢？其實歷史的客觀性是根本不容懷疑的。史學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歷史，祇有使歷史的客觀面貌越來越清楚。「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廬山的真面目即客觀地存在於遊人的四面八方的觀賞之中。我們絕不能因此認為，廬山客觀地具有無數的面目、或根本沒有任何面目。兩千年前，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句話早已接觸到了史學上客觀與主觀問題的核心。「古今之變」是客觀的歷史；而司馬遷用他的「一家之言」來「疏通」「古今之變」，則是史學家的主觀解釋。但是以史記而言，司馬遷的主觀解釋不但絲毫無損於歷史的客觀，反而照明了「古今之變」。

司馬遷自稱其書為「一家之言」，班固雖不同意他的觀點，卻也不能不承認史記是「實錄」。這正是由於史記的疏通工作是建立在史料考訂的堅固基礎之上，即所謂「網羅天下放佚舊聞，考之行事。」所以史記是中國史學傳統中「疏」與「證」結合，主觀與客觀交融的一成功的範例。而司馬遷之所以能有此輝煌的成就則不能不部份地歸功於他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有一種極深刻的感受。班固批評史記說：「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實這些地方正顯出了司馬遷的「良史之材」。他撰史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世，但朝廷的功令並不能使他無視於當時在文化、社會方面十分活躍而為大一統的政府所不喜的種種力量。史記著重地記載了黃老、游俠、商賈的活動，一方面這是作者「一家之言」的一種表

現，另一方面也恰好是作者時代的忠實反映。史學的主觀與客觀在這裏不是對立而是統一的。

如果說史料學派的特色是史學與時代的脫節，那麼史觀學派的特色則恰好相反，即史學與時代相合得過分密切，有時竟至達到古今不分的地步。這兩派之所以如此背道而馳是和他們對待史學的態度分不開的。史料學派是「爲史學而史學」的，根本不考慮他們認爲與史學無關的任何外在因素，包括所謂「時代」在內。因此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考證一件孤立的史實。近代中國的史觀學派則自始便不是從純學術的立場來研究歷史的。他們的史學主要是爲現實服務的，或者更具體地說，是爲他們所從事的政治運動尋找歷史的根據的。我們必須指出，這種態度的本身是絕對無可責難的；相反的，一個人如果真是從愛國家、愛民族的純潔動機去治史，他正是表現了一種高貴的道德情操。晚清許多史學家如章太炎、梁啟超之流便曾從排滿、革命的觀點對中國的歷史下過不少重要的論斷。所以我們所說的史觀學派在中國已有很長的一個發展階段，絕不限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過在今天來說，我們檢討中國的史觀學派自然不能不以唯物史觀爲主要的對象。

史觀學派因爲完全從現實政治的要求出發，最後必然地模糊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界線，並從而否定了歷史的客觀性，爲了應付眼前需要所寫出來的歷史，雖然表面上是在分析過去，而實質上則處處是影射現在。這樣一來，歷史就變成了一個任人予取予求的事實倉庫，它本身已沒有什麼客觀演變的過程可言了。而且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又是和政治任務的迫切性成比例的：當任務最迫切的時候，史學上的一切求知的戒律都將被棄置不顧了。過去幾年中，在中國大陸上佔據着統治地位的所謂「影射史學」便是史觀學派最極端的一種發展。

一方面，對於史學應當配合時代，這種觀點，我們基本上是同情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則強調，史學和現實之間又必須保持着適當的距離。史學對我們可以有啓示、有昭戒，然而並不能直接爲現實服務。史學作爲一門學術而言是有其紀律的尊嚴的；破壞了這個紀律不僅毀滅了史學，而且也混亂了現實，以自然科學爲例，任何一門科學都有它的基礎研究、理論研究，這是科學的紀律的基本要求。我們當然希望這種基礎研究最後可以發生實際的效用，但是我們絕不能爲了急於求實用之故而去干擾科學的紀律，史學研究也完全是一樣的。沒有基礎研究，史學便根本不能成爲一種獨立的學術。至於這種研究到底何時發生效用、如何發生效用、以及發生何種效用，則是無法預知的。唯一可知的是，史學研究和一切科學研究一樣，如果針對着時代的需要而善爲規劃，其結果總不會是完全無用的。

從理論方面看，史觀學派也有其基本困難。我們在前面曾分析了史料學派對史學上客觀性的問題認識不足，現在我們要指出，史觀學派，特別是唯物史觀，對於歷史上所謂「規律」(law)的問題缺乏清楚的交代。史觀學派的史學基本上是負擔着支持政治運動的任務的。而史學所能給予任何政治運動的最有力的支持，莫過於宣告這個運動是代表了一個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樣的說法最足以瓦解反對者的抗拒意志。這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所宣揚的「奉天承運」的天命論，實際上是有着同樣的作用的。但是今天是科學的時代，天命論早已破產了，祇有科學才有無可抗拒的說服力量。「歷史潮流論」便正是以嶄新的科學面貌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的。

「歷史潮流論」建築在「規律」的基礎之上。這個潮流之所以被視爲不可抗拒，是因為它遵循着歷

史發展的規律。自然界的一切運行必然遵守自然規律，這一點已為近代科學所證明，無可置疑。如果歷史發展也有它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又已在史學上完全獲得了證實，那麼依照着這種規律而運行的歷史潮流自然也是無可抗拒的。現在讓我們以唯物史觀為例來檢查一下「規律」這個概念的確切意義。

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中，有兩個重要組成部份特別具有「規律」的涵義，或者說是被馬克思主義者著重地當作「規律」來宣揚的：第一、在縱的發展方面，人類社會必然經歷五個階段，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第二、在橫的結構方面，物質生活中的生產方式是下層基礎決定着政治、社會、文化等上層建築。

就第一點說，馬克思的五階段論是根據他觀察西歐歷史所獲得一種綜合看法，他自己並不承認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當他的追隨者要把他的理論應用於俄國的時候，他立刻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他明白地指出，西歐的特殊歷史經驗不能轉化為一般性的歷史哲學學說，以為一切民族都必然經過同樣的歷程。他更進一步說，凡是把一般性的歷史哲學學說當作萬靈方的人都不可能瞭解歷史，因為這種學說在本質上是超歷史的（*super-historical*）。正是因為當時的追隨者濫用他的歷史理論，馬克思才憤然地說：「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既然自己堅持他的歷史理論僅限於西歐一隅，則這個歷史階段論當然不可能具有科學規律的普遍意義。

關於第二點，馬克思的確是當作一種普遍規律來陳述的。但是根據現代哲學家的分析，生產方式和所謂「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仍然有欠明確，遠不能與科學上嚴格意義的規律相提並論。如果每一個時代的上層建築如哲學、藝術、宗教等是被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麼一種生產方式最多祇能決定一